

【作者简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和董必武创办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主管武汉区委组织工作，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24年后任中共武昌地委书记兼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在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即今河北省）宣传部长、山东临时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进入革命根据地，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粮食部长。红军长征后，留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到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2月被捕，同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

中共

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

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陈潭秋

1921年6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做饭。另外，他的任务是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①本文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后转载于1951年出版的《党史资料》第1期。



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①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炳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工作，执行与共产党斗争的专门任务。广东的代表为包惠僧，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为周佛海^②，现在是国民党的著名领袖之一，而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其进行反党活动，即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而李达则在五卅后为革命浪潮高涨惊骇，而退出党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了党的屡次警告，结果仍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即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家。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名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在第一次大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在1927年革命严重时期，他自己的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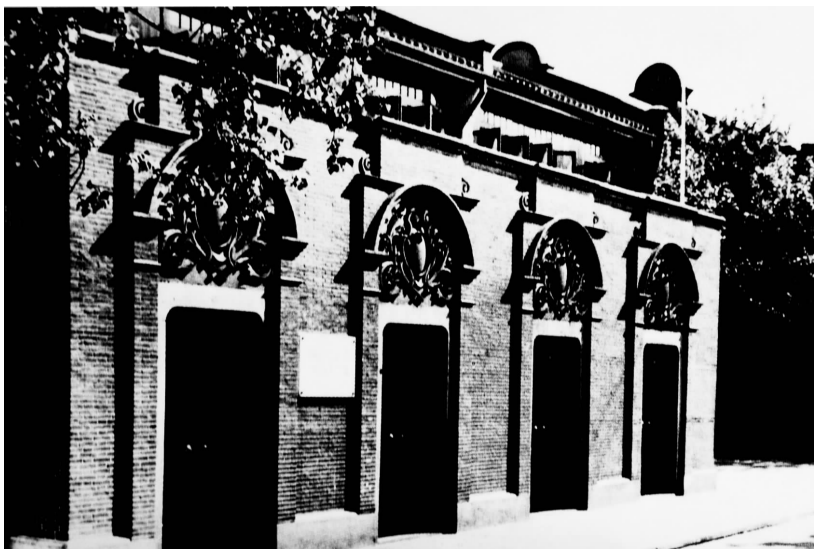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7月初开的^③。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

①共产主义小组，现在统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②周佛海后沦为汉奸，日本投降后死于南京狱中。

③本文编者按：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准确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5页。下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图为中共一大会址。

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申明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成为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李汉俊的观点,拥护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照例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了这两个都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采



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通过这些方针，成为建立中国党的开端。最后的批准党章，改在大会的第四日的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8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都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正没有经过10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大家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估计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计算七天完结大会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继续大会工作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因此，即在嘉兴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盯梢。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8点钟后，即有许多游人。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10点钟时，下起小雨来，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我们一直讨论到晚上11点，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举行了中央局的人选。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与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更坏一些。因为他自己的武断宣传，使群众徬徨。这一种思想受到了大会代表的反对。对这个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的有区别的对待，但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通过了

这一原则，可以说与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的合作放下了基石，同时也是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得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完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13年后两次到日本留学，1918年回国，发表文章介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早期共产党组织，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脱党，任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和教育工作。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同年12月重新入党。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被迫害致死。

第一编

1
0
2
1
1
0
4
0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①

□李 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主席语）。这一变化的伟大开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六三”运动。这一运动，是马列主义者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序幕，是工人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雏形，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的基础，思想的准备与国际的声援等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丁斯克（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

①原载1951年出版的《党史资料》第1期。

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联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弃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的社会团体，都表示过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威丁斯克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的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恳地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也和他疏远了。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丁斯克到了上海，访问了陈独秀、李汉俊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会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丁斯克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联和联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个时候，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这个组织发起以后，就函约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组织，董必武同志在武汉组织，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谭平山（现属民盟）在广州组织，王烬美在济南组织，施存统在东京组织，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络很欠缺。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征求当时进步青年做团员。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渔阳里二号楼两底的外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由威丁斯克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同志主持。这SY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此外另行出版《中国共产党》（报纸，六开本，约32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1月间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小沙渡路筹组组织



工会，但未组成。

11月间，孙中山邀约陈独秀去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主编。12月间，威丁斯克回到苏联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00元，大家却无力负担。《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中国共产党》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主张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牢骚，写信给我，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他的本性原是一个热衷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6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7个小组，共有党员40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长沙二人	毛泽东	何叔衡
武汉二人	董必武	陈潭秋
上海二人	李达	李汉俊
北京二人	刘仁静	张国焘
济南二人	王烬美	邓恩铭
广州一人	陈公博	
东京一人	周佛海	



中共一大会址内景。

李大钊和陈独秀，均未参加。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女校里。

1921年7月1日^①下午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贝勒路某里2号的过街楼上^②，正式开幕了，代表12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

标语。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他首先说：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了，他代表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最后他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他是荷兰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话声音洪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说完话之后不久，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地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我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十多个巡捕，拥进那个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这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国话，他和那些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开会，那些巡捕也只好走了。

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准确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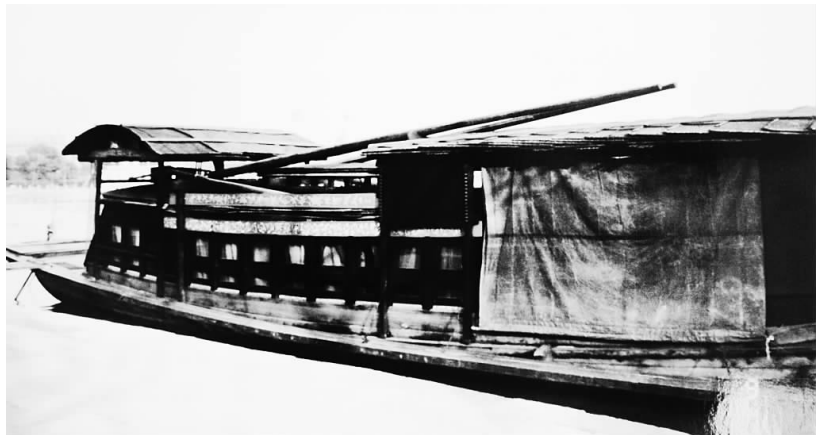
②本文编者按：开会地点应该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5页。



7月2日起，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当时的党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对于马列主义懂得很少，对于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的话，更谈不到。当时的同志们，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大体上是懂得的，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应用，却是不会。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却还不曾想到。但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列主义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阅读那些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的著作，总是细心体会：那些著作中的理论在中国究竟如何应用？如何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看一本书，比介绍那本书的人要懂得多，懂得透，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总能得到相当的益处，最重要的地方，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去阅读，这是别的同志所不及的地方。他在代表住所的一间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专心一志要推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说他是个“书呆子”。毛泽东同志要把马列主义的

嘉兴南湖游船，中共一大当年移至此种游船上召开。（李海文摄）



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一伟大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这时已经开始锻炼了。

代表经过了几天讨论交换意见以后，决定于7月6日前往嘉兴南湖开会（因为在上海找不到适当的会场）。这一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到达嘉兴，在南湖的一只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可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大会从上午10时半起到下午4时半为止。会议中首先讨论工运工作的计划，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其次，讨论过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于改良主义的偏向。当时因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已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未能满意，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话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用“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作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摄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于是大会宣告闭幕。次日，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了上海。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党的组织阵容相当整齐了。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表现了成绩。我这里只说起中央工作部在1921年7月以后至1922年7月的工作情形。这年8月底陈独



秀辞去了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的书记工作，经常与马林和尼可洛夫取得联系。宣传工作方面，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机关，并续出《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出至第七期停刊）。此外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9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15种，还出版了几种临时宣传性的小册子。

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去询问那招牌是谁悬挂的，他听了这个消息，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在他离开上海起到第二届代表大会止的期间，上海几乎没有做工人运动。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露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遇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唯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

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在法租界被捕过一次，由孙中山打电报给法领事获释。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去看信件，因为各地的信件都由我收转。他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打板凳，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搞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他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会法文）。他和时事新报辩论时曾说过我们“只打倒资本家并不打倒资本”的一句话（见《新青年》第八卷）。他在报纸上写普通的政论是动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他不研究。《响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他有时忽发异想，说我们到四川去，关着门干社会革命去。有一次，又发怪脾气，接连一月拒绝和马林他们见面，我去劝他时，他说“我们可以独立干

革命，毋须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我说，“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的教训，中国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能够成功么？他对此默然无语。以后他虽然和马林他们见过几次面，却仍是貌合神离。12月间，马林他们回到莫斯科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在这时已经暴露了出来。

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值得一说的，是中央工作部通知各地支部选派了几十名SY团员到莫斯科去学习，这是后来替党增加了很大的力量的。

我的回忆写到这里为止，最后写几句结语。

一、初期的党，正在幼年期，所以有许多不纯的分子混入进来，其中有地主，如沈玄庐、陈独秀、张国焘；有资产阶级，如陈公博；有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如李汉俊、周佛海等；还有受不起考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忠诚的同志们，却代表着党的新生力量。这新生的力量，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的前卫，终于战胜了那腐朽的反动的力量，使我党能够成长壮大起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初期的党员们，有一部分即使是忠实于马列主义，但仍是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不懂得的。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教条主义的偏向才逐渐克服下来。

三、党的初期，只听说高唱无产阶级革命，高唱劳工专政，所以专只做工人运动，从不曾想到农民问题。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纠正这个偏向，指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因而壮大了革命的势力。

四、党的幼年期，多数同志们幻想着中国革命可由全国工人总罢工来实现革命，从不曾注意到武装斗争。幸亏毛泽东同志早就注意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终于用武装的人民打倒了武装的反革命。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①

□无名氏

一、上海工人纠察队成立的经过及蒋在事变前的阴谋

我上海工人，自前年五卅以来完全统一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买办阶级、流氓、侦探艰苦奋斗，不仅为自身谋解放，兼以为市民争自由，为全国求独立解放。自北伐军兴长驱入赣浙，本会更率领全上海80万工友急谋响应。远在去年10月，即曾起义一次，不幸失败，工友死者10余人被拘者100余人；失业者500余人。今年2月2次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杀害工人和共产党员。图为蒋介石军队占领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

又不成，工友死者40余人被拘者300余人，失业者1000余人。直至3月21日三次起义，全上海80万工友一致奋起，徒手与奉鲁军肉搏，缴除奉鲁军枪械，接应北伐军入沪，才使上海很迅速的归入国民革命军旗下。当时奉鲁军因处处受工

①本文是上海总工会的报告，原题为《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之情形》，发表于1927年武汉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蒋（介石）逆铁蹄下之东南》。后转载于1951年出版的《党史资料》第1期。



4月12日中午,上海各界民众50万人集会,抗议蒋介石军队的反革命暴行。

人群众包围,逃避不远,故南京焚劫之惨祸,得免现于上海,是役工友死者200余人,伤者在千人以上。本会工友,赴义之勇,与维护地方治安之功绩,早为社会各界所称赞。本会之武装纠察队,即系勇敢工友将夺自奉鲁军手中之枪组成,所以不即解除,盖一则奉鲁军阀未灭,前线战事犹急,北伐党军开上前敌,后方仍须保障,而北洋长警肆虐多年,早在此次战役中溃散,故留此工人武装与商人之保卫团共负治安之责。再者,上海为帝国主义之大本营,为一切买办阶级、军阀官僚、流氓、侦探所汇集地,对于一切革命势力、革命组织必多方肆其破坏,过去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收买流氓,资给金钱枪械,使捣毁工会,残杀工人领袖之事,已数见不鲜,今以80万工友之组织保持不满3000人之武装,以为自卫,实有必要。国民政府亦既嘉奖本会工友之起义,并允许保留此工人纠察队为民众自卫之武装,视同正式军队,一律待遇,则凡革命军队领袖,应如何遵照斯旨,爱惜拥护,乃自蒋介石到沪以后,对此有革命历史之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不闻有爱护之意,反只有不慊之言,积极进行其破坏压迫之毒计。呜呼我上海80万工友,牺牲无数性命,所欢迎来的人即是预备屠杀我们的人,是诚我上海工友不及料,而亦一切革命人士所同声悲痛者也。兹将蒋在4月12日前向工人进攻之阴谋列举如下:

1. 当蒋介石初抵上海时,帝国主义者即问蒋能否镇压上海工人之行



动，蒋不惟无一言反对，反以外人说话为口实，要上海总工会解除纠察队武装，以除去外人之误会。后又要求纠察队归其指挥调度，均经总工会说明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卫组织，蒋虽然无词，但仍表示对工人武装持怀疑态度。

2. 蒋介石本来是上海青红帮的一个，一到上海，即与上海流氓首领黄金荣、张啸林等连结，出款60万，组织长江一带流氓，由帝国主义者及中外反动资本家，共同资助金钱枪械，专门捣毁工会及一切革命机关，暗杀革命分子。

3. 上海工人自前年五卅以来，即完全统一在上海总工会之下，做革命奋斗。蒋到上海，便另指派一些流氓在其政治委员会办公之沪海道署内，另设立工界联合会，到处向工人宣传，反对上海总工会。

4. 当第二师刘峙未开离上海时，即四处散布谣言，说工人纠察队自由捕人，扰乱社会治安；说工人纠察队要冲入租界，引起国际交涉。借此问题，密派军队将纠察队及上海总工会四周包围，预备缴械。上海总工会一面派代表向军事当局说明，勿信谣言，一面又登报声明，本会工人，决无单独冲入租界之事，本会工人纠察队，非有事故决不携械外出，决不自由捕人。此声明登载至一星期以上，后因刘师开拔，形势方较缓和。

5. 当缴械的前数天，本会已迭接工人报告：蒋与帝国主义共同组织之流氓已集中500人，每人发给盒子炮一支，定期由租界冲出，由军队接应帮助袭击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假名工人互相冲突，军队即借此解除工人武装。

蒋介石为何如此仇视上海革命的工人，客观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原因，第一，因为他的思想行动，完全仍是封建独裁的习惯，他处处是要民众服从他的统治，不是他自己去服从民众而行动。第二，他的左右几乎皆为右派反革命分子所包围。尤其在革命势力伸张之今日，一般从前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知道：徒然在国民党外反对革命，已经无用，皆立刻摇身一变而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国民党员，去阿附蒋介石，于是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皆一致赞成蒋介石为国民党中之稳健派领袖。并向蒋提议，如南方能除去急进分子，限制工农运动，驱逐俄国人则南北无不可以合作之点；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亦无不可以承认之处。我们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已成为一切反动分子的领袖，在行动上已完全接受帝国主义

北洋军阀的提议，他怎得不仇视上海革命的工人，以及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呢！

二、4月12日晨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的经过

总工会之纠察队总数共有2700人，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当第一军第二师刘峙未开走时，其军队对闸北总工会会所及纠察队总指挥处，纯取包围形势，十分严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自第二师开走，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队开来后，即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于是闸北戒严情形，已较前松懈。延至11日下午4时后，忽有二十六军第二师大批军队，散布街市，形势十分紧张，纠察队总指挥处亦迭接各方密报谓今夜将有流氓，由外人保护从租界冲出，联合军队袭攻工人纠察队。纠察队总指挥处当即送函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望予援助；但未得答复。纠察总队指挥处遂通知各地纠察队，加紧戒严。延至次晨（12日）4时左右各地流氓军队，同时动作，向纠察队进攻，兹将各地经过分述如后：

1. 闸北总工会会所。12日晨4时许，总指挥处方面据闻湖州会馆总工会所发生枪声，工人纠察总队指挥顾顺章，即偕卫队二人，军医及书记等往该会馆总工会会所视察情形。入内略事休息，约过20分钟，枪声复作，顾氏出外探视，即见60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20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10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便衣军的械。”说毕，即将所有便衣军枪械，未经抵抗，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及香烟，邢团长简营长即对顾谓：“既有今夜这事实发生，请你们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纠察队员同往，诘行至半途，邢团长突然变色谓：“他们（指便衣队）枪械已被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呢？”章营长即指挥卫队，将顾及纠察队之械缴下，又令顾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顾坚持不可，谓：“本会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能擅专。”于是邢团长张营长即